

3月28日凌晨,著名作家、学者齐邦媛去世,享年100岁。

齐邦媛的名字为大众所知,缘于她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所著的自传体回忆录《巨流河》,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,记述纵贯百年、横跨两岸,见证了大时代的变迁。该书被称为“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;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;一部中国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;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。”

书中所记述的齐邦媛与空军飞行员张大飞的旷世之恋,被读者视为《巨流河》里最动人的篇章,而南京是这段故事的起点,亦是终点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王凡 白雁



扫码看视频

《巨流河》书封

快写人物

CHARACTER SKETCHER



齐邦媛生前照片

新华社记者章利新摄

齐邦媛:魂归巨流河

他们的最后一面

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,令齐邦媛终生难忘。1937年冬,齐邦媛从南京到汉口,1938年春,从汉口流亡到湖南长沙、广西桂林等地,再进四川,最后在年底到达重庆,入读南开中学。与此同时,报名军校的张大非已经改名张大飞,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,回国后加入飞虎队。

张大飞受训回国期间与齐邦媛在重庆有过见面,但更多时候,写信是他们之间唯一的通信方式。他们诚挚地分享各自的成长经验,一个在升空作战,一个是诗书之间,张大飞在齐邦媛眼中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,但他们“未曾一语触及内心,更未及情爱”。

1943年,张大飞赶到南开中学探望齐邦媛。两个年轻人不会知道,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——

一九四三年四月,我们正沉浸在毕业、联考的日子里。有一天近黄昏时,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,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,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。

我出去,看到他由梅林走来,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。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,说:“邦媛,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,这么好看呢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,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。

他说,部队调防在重庆转机,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,只想赶来看我一眼,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。我跟着他往校门走,走了一半,骤雨落下,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,在一块屋檐下站住,把我拉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,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。隔着军装和皮带,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。只有片刻,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,说:“我必须走了。”雨中,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,上了车,疾驰而去。

这一年夏天,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,溯长江远赴川西。一九四三春风远矣。

“今生,我未再见他一面。”写下这样的字句时,齐邦媛的心里该有多痛。

25万字的《巨流河》,其中一半内容是抗战流亡的家国悲歌。1945年5月18日,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,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。

张大飞留下一封信给齐邦媛的哥哥,是一封诀别信,表达了在重庆见面时对齐邦媛表达爱意的懊恼,因为他自知是“必死之身”,他希望齐邦媛的哥哥劝妹妹忘记自己,“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。”

另外,张大飞留下一个很大的包裹给齐邦媛,是那些年齐邦媛写给他的信。

“从此之后,我不再提他的名字。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,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。我想,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。”

如张大飞生前所祝福的那样,齐邦媛发展得很好,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,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,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,1988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,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。执教之外,齐邦媛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,卓有贡献。

“重逢”

自齐邦媛和家人1937年底逃出南京城,此生只回过南京两次。

一次,是1946年她无意中参加了张大飞的追思,一次是1999年5月,她到了南京,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。

那是齐邦媛与张大飞的一次“重逢”。那年齐邦媛75岁。

在《巨流河》第十一章里,有齐邦媛克制的记述——车子在山路绕行的时候,我好似在梦游境界,车停处,山路也宽阔起来,走进宽敞高昂的石头牌坊大门时。开始登上石阶,我仍疑似梦中。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旅!直到迎面看到亭里立着国父孙中山所写“航空救国”的大石碑,才开始相信,这是真的了。

这一大片墓碑,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。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,我放开章斐(注:老同学)牵着的手。静静地,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。去北京前,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,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。

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。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,他的那一栏,简单地写着:张大飞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。一个立志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男子,以血肉之身殉国,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。

后来在母亲的遗物中,齐邦媛找到两张他升上尉和中尉的军装照,脸上是和硬挺军装不相称的温煦的笑容,五十多年间,她在许多的战争纪念馆重寻他以生命相殉的那个时代……

“张大飞的一生,在我心中,如同一朵昙花,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,迅速阖上,落地。那般灿烂洁净,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。”齐邦媛如此写道。

据中新社报道,齐邦媛去世后,她的挚友、诗人席慕蓉在接受采访时提到,2023年11月,席慕蓉最后一次接到齐邦媛的电话。席慕蓉一直尊年长自己19岁的齐邦媛为师,她们经常见面、通电话。

齐邦媛在那通电话中与席慕蓉表达告别之意。“她跟我说‘再见’,当时,我也明白了她的意思。”席慕蓉说,齐邦媛年事已高,身体情况不允许太多人去打扰,她希望自己能够安静地休养,遂与朋友们告别。“所以我也回答,好的,谢谢齐老师。”

齐邦媛走了。也许,沿着记忆之河逆流而上,她又会回到祖国那个叫“巨流河”的出发地。



齐邦媛(后排右一)与家人合影 图片来自《巨流河》

南京,最接近故乡的地方

齐邦媛的一生,被裹挟于大时代的一次次转折之中。

她1924年2月19日生于辽宁铁岭,经历了民国时期东北命运的跌宕,感受到日军炮火带来的伤害和恐惧,1943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,一年后转入外文系,受教于朱光潜、吴宓。1947年赴台工作时,她购买的是往返双程票,不料,这一去就是大半生。

“南京是我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。”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中这样写道。

1930年,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夕,齐邦媛随母亲从东北流亡到南京,投奔在南京政府做事的父亲齐世英。鼓楼小学、山西路小学、宁海路、三条巷、新街口、玄武湖……都曾留下齐邦媛的印记。

《巨流河》的前半部分故事涵盖从“九一八”事变开始的整个抗战史,齐邦媛从一个战乱中的小女子视角,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,她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,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、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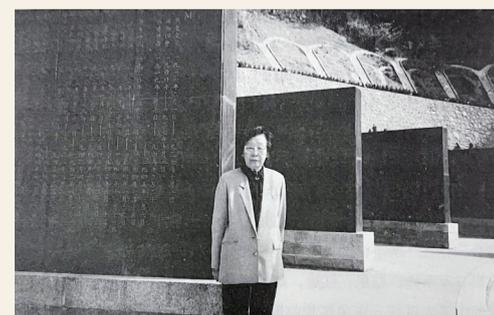
就是在南京生活期间,齐邦媛结识了一个从东北流亡而来的18岁学生。这名学生的父亲是东北政府官员,因抗日而被日军残杀。那时候,他的名字叫张大非。

“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,没有人注意他。他静静地坐着,很少说话,也不参加游戏。吃饭时,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,不断地给他夹菜。”

在齐邦媛的回忆中,与张大非的一次同行登山刻骨铭心——

有一天吃过中饭,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,牛首山。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,就追着赶上跟了去。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,突然起了风,我比他们走得慢,渐渐一个人落后了。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,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,进退两难。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,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。这时,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。天色渐渐暗了,他竟然走回头,往山上攀登,把我牵下山。到了隘口,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,说:“别哭,别哭,到了大路就好了。”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,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……

“数十年间,我在世界各地旅行,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,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。”齐邦媛写道。



齐邦媛在南京“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”——张大飞列名的碑前 图片来自《巨流河》